

大纪元

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下）

王友琴



萧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网络图片）

更新: 2017-03-09 12:49 AM 标签: [肖光琰](#), [陈梦家](#), [芝加哥大学](#), [文革受难者](#)

【大纪元2017年03月08日讯】（接[上文](#)）

萧光琰

萧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时年48岁。两天以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一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萧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网页上检索出萧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1946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CRERAR图书馆里。论文题目是“叶绿素荧光发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树叶和叶绿体中”。科学发展也许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中的一部分。但是文革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文革中，萧光琰全家三人都被害死，哪里还谈得上保存论文这类事情。

萧光琰1950年回中国，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出生长大，随萧光琰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萧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萧光琰被当作“白旗”批判。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时间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个“运动”。8月，毛泽东派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化学物理所“占领上层建筑”。有的工宣队员态度凶恶，动辄动手打人。10月5日，萧光琰被抓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两个月零六天后，他满身伤痕地死在被关押地，并被宣布是“畏罪自杀”。

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一百多人被指控为“特务”。实际上，“特务”是文革的重点要抓的“敌人”之一。在文革中，“阶级敌人”由文革前的五大类变成了八大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在萧光琰的研究所，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在这过程中，有七个人死亡。这七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

张存浩先生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该所研究人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1968年他从家里被抓走。他家被抄了7次，连地板都撬开。他家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

张存浩的12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他被抓进去以后，人们看到在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也有些可笑：

被抓进“牛棚”以后，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名单。“专案组”逼他承认名单上的人是他的“特务”组织成员。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己12岁的儿子会被列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骂他“态度不老实”。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

1968年和张存浩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七个人如萧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们是“自杀”了吗？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说出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了。

我从图书馆书库中取出了萧光琰的博士论文。捧著这本绛红色布面精装的论文，让我再一次为写了论文的人和他被毁灭了的三口之家感到痛心。

萧光琰在25岁的时候完成了博士论文。知道他的人说，他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都常在实验室度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甄素辉和他的约会，都会被他拉到实验室度过。

图书馆的值班女士正好是作了这批论文的电脑索引的人，非常认真地给我解释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还在发展完善这些索引。显然她有非常好的专业训练并且热爱她的工作。萧光琰的论文上写有指导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学](#)的化学研究所是以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书库中萧光琰的论文有两份，她说，很可能这多出来的一份原来是Franck教授的，原来在教授的办公室里。教授去世之后，把这个副本收到了图书馆里。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的研究方向有两项，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萧光琰是他在后一方向上的学生。1947年他退休以后，仍然领导芝加哥大学光合作用研究组十年。

说到光合作用，1958年，留学过美国的中国力学学会会长钱学森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次发表文章说，计算每亩地得到的太阳能经过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转化成20万斤粮食。他完全不认为关于光合作用是否要问专家如萧光琰，而不是他一个力学家应该乱说的。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粮食亩产不断增加，最高的达到13万斤。在这个疯狂的吹牛之后，中国出现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但钱学森从来没有为他的胡说表示道歉。

萧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为文革时代的“先进典型”。我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个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报》。那时报纸很少，而且这家中国最大报纸全部只有六个页面，因此被《人民日报》报导是极难得的荣誉。这些文章的标题，有“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此等等。以这种样板指导全国，制造了多少萧光琰式的惨剧呢？

2005年，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领导人（中共党委书记）白介夫（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北京：《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是资深共产党人，1937年去延安后入共产党，1957年出任中国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领导人，他坦率承认他当时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学化学课本里的），却要领导萧光琰这样的专家，还错误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把萧光琰当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萧光琰这样的人更全都成为“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被派去领导这个研究所的“工宣队”，直接动手打人，还使用刑具。他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萧光琰生前所经历的。他主动表达的歉意因为在领导干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见到，所以特别值得珍视。

陈梦家

1944年，陈梦家和他的妻子赵萝蕤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从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在路上用了两个月。陈梦家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副教授，赵萝蕤是云南大学英文系的讲师。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四年后，取得了英文硕士和博士学位。陈梦家早赵萝蕤一年回国，在美国时对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国青铜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查，照相，制作铭文拓片，并结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写下了一部英文的研究书稿。

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在1948年5月清华校庆的时候，清华文物陈列室正式开展，陈梦家是主持文物展览的四位教授之一。他们在筹建清华博物馆。陈梦家在从美国写回中国的一封信里说，看到美国“城市无论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或与大学美术部合作，或为中小学实地文化课程讲解之处，故博物馆实为民众教育之机构，同时又为讨论讲学之所。”他赞赏美国博物馆制度并且想要在中国推行。他也是那样类型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有好东西，就想学习并在中国也做起来。

1948年春天，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中国。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Ancestry of“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这对夫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一个向中国学生教授英文文学。陈梦家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在他们身上，中西学术和文化正在交融和发展。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作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陈梦家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一度精神分裂。

1957年，中国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曾经留学欧美的人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特别高。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罚分为六种等级。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相识于芝加哥大学的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北京任教，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比起那些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们来说，陈梦家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荒。

1960年，食品严重匮乏。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个亲戚由政府派往欧洲工作，设法从国外带来一些奶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奶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奢侈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年青的时候是诗人，这时依

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他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忍耐著，熬过了三年挨饿的日子。

1962年，他在美国收集资料编成的青铜器研究印刷出版了，一部很厚的书，没有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按照规定不能出版书籍。那时连数学书都不允许“右派分子”出版。

1965年初陈梦家摘了“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曾经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请看《[文革受难者](#)》中的“左奶奶和马大娘”。）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由会杀猪的人来杀，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

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出了《新月诗选》，这是“新月诗社”的诗人们在193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由陈梦家编辑，那时候他20岁。书中有他的一首诗如下：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是皇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他20岁的诗里，新月是一个美丽的隐喻，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由于安眠药毒性不足，那天夜里陈梦家没有死。他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把她的头发剃去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为形似“阴阳”图案。后来，在北京大学校园中，赵萝蕤又遭到“斗争”和殴打。北京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员悲愤地告诉我，她亲眼看到，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竟然还有赵萝蕤曾经教过而那时已经留校教书的年轻女教员。她感到悲愤，一是为赵萝蕤的惨痛遭遇，一是为当时北大人的堕落。

十天以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东城区钱粮胡同家中上吊身亡。时年五十一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十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清楚地把打死数千和平居民称为“战果累累”。仅仅这个标题和文中的死亡数字，就表明文革的残忍和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2006年，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甲骨文—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航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这名记者1990年代到中国居住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陈梦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是因为陈梦家是甲骨文专家，而且因为这名记者对他的命运和遭遇感兴趣。Hessler认真采访了认识陈梦家的人。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一个地质学家，讲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陈梦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红卫兵大喊“送上门来”，抓住他用铜头皮带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陈梦家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打。Hessler还采访了陈梦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着陈梦家被摧残折磨的人和1957年写文章攻击陈梦家的人。他同时还在观察今天的人怎么记忆或反应这个话题。

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员的对话，陈梦家被害死时这个人是考古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谈到陈梦家的死亡。书中写道：

从这个人（被访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别他是否觉得负疚或者感到难过，或者是否有任何别的感受。（225页）

Hessler的含蓄的叙述在告诉我们，当文革摧毁了陈梦家和其他受难者的生命之外，还有别的比较隐秘微妙的东西被毁灭了，那就是人的恻隐和怜悯之心以及进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的暴力迫害是受难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人心和氛围也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

陈梦家被害，已经是历史，是在毛泽东的强力之下中国人无法拒绝的一幕历史惨剧也是丑剧，也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怎么来说来谈来看来想，却是当下的中国人的选择。

Hessler先生告诉我说，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难者](#)网站上关于陈梦家的文章。那是我在经过调查后在2000年写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努力穷尽所有的已有的关于陈梦家的材料。）我在那篇文章里只写了谁是陈梦家和陈梦家的悲惨遭遇。Hessler的描述增加了一个文革历史记录的新向度。

另外，芝加哥美术馆的研究员Elinor Pearlstein已经完成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所从事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写得非常缜密的文稿，特别是其中比正文还长的详细注解，我深为她的工作的认真感动，也为陈梦家的工作得到后人研究而欣慰。

受难者的提醒

五名受难者加上萧光琰的妻子甄素辉和女儿萧络连，七个鲜活的生命，被用残酷的手段摧毁了。这是怎样的罪恶！而且，我听说还有别的人，还在进一步的寻访中。

迫害早在文革前就已开始。就在五名受难者中，王均在1952年就被判刑劳改，陈梦家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光琰在1958年就被当作“拔白旗”的对象来“拔”。文革把这种迫害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和更狠毒的程度。不但从事人文学科的人被害死，和政治相隔很远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被害死。

芝加哥大学的石头房子一百年来耸立依旧。一百多届毕业生，离校后的生活和成就当然各异，然而像这五个人那样被大规模的反人类罪所毁灭的，只有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毁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三千多名受难者中有三名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

文革迫害当然并不只是针对这五个人也不是针对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的。文革是全国性的普遍的大规模的迫害。五人的名字是在随机的调查中发现的。我并没有能对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完全的跟踪调查。但是仅仅这五人，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革迫害的广度和密度。芝加哥大学毕业生的遭遇只是文革全部惨剧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也是整个迫害、监禁和杀戮大场景的一个缩影。

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身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制度。毛泽东甚至修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他说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人被害，其中有个人的或者偶然性的因素，但是那些都不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他们被害，就是因为他们被圈入文革指定的打击对象群体之中。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通知》中，明确列出了五个“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作为重点。五名受难者中三人是教员，肖光琰的妻子甄素辉也是教员，教师是文革的人数最多的目标群体。五人中二人是研究人员。一人从事人文科学，成为“学术界”中的“资产阶级权威”。另外一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但是文革中除了直接为核武器等军事项目工作的科技人员外，广大科技工作人员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到迫害。另外，这五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曾经在西方的大学学习和研究。这些教育经历和工作职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受人尊敬的或者至少是不被蔑视的，但是在文革时代，就构成被迫害甚至被杀害的罪名。文革的捞捕网的网眼是比照他们设计的，他们没有办法漏网逃脱。

当然，没有一个人应该受到这样的迫害，不论是曾经留洋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人权是平等的，生命是同样宝贵的。实际上，在文革中有大量只受过很少学校教育的人也受到了深重的迫害。只是对这五名受难者的残害，不仅证实了文革的反人类罪，还体现了文革对他们身后的大学制度的仇视和破坏，对他们代表的学术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和摧残。

芝加哥大学的主体是一组哥特式石建筑。我曾经想过，为什么1891年建立大学的时候，要造这种样子的石头房子呢？这些建筑风格古老，尖顶高耸，坚实稳固，无疑是能表现一种强有力的对学校在文明中的作用的象征。学校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文明的代间传承，特别是知识和道德的传承。

这种传承不是不可质疑的。数年以前，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一组人在宿舍试验了使用不分男女的卧室、厕所和浴室。实行两个月后，他们决定回到原来的男女有别的常规制度。我对年轻人的这种质疑和试验的态度本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传承又是决不能随意破坏的。文革“彻底砸烂旧世界”的狂妄理念和大规模杀戮迫害的恐怖实践，正告诉人们保卫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传统价值并不是天然就长在那里的，好像一座山或者

一条河（连山与河都会被污染破坏）。文明需要我们的维护、建设和坚守。让五名受难者不断提醒我们吧。

附记：在这篇文章之后，笔者又发现了另外八名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文革受难者。会另文写出。#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06年7月

责任编辑：莆山

推荐 高天韵：文革“红八月”的冤魂—卞仲耘
推荐 【热点】文革50周年 中国急需重拾传统道德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纪元.

2017-03-09 12:49 AM